



胜利日大阅兵

德等国语言尤为娴熟。抵达上海后，他在徐家汇语言学校全日制学习中文，同时兼任徐汇公学（现徐汇中学）监学，同时教授法文和化学，除此之外还被聘为震旦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主讲英文和自然科学。至于“饶家驹”这一名字的来历，苏智良说，可能“饶家驹”的上海话发音与法语“Jacquinot”很相像。而到了“八一三”淞沪战役时期，饶家驹已在上海生活多年，不仅学会了流利的上海话、北京话（类似于如今普通话），更因为曾于1914年至1934年间在虹口圣心堂担任神父而长期与日侨交流，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饶家驹还曾担任上海公济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经常造访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如此种种，令这位外国神父在上海广有人脉。无论是什么阶层还是国籍——中国人、欧美人、日本人，他都有结交。

也正因此，在1937年11月初，当增援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导致第三波难民潮起，城乡民众纷纷绕过无法进入的租界而从徐家汇、龙华等地汇集南市时，饶家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中日双方艰难交涉。苏智良、王海鸥的书中记录了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员田伯烈（H.J.Timperley）与日本同盟通讯社记者松本重治的一段对话。田伯烈告诉松本：“贾基诺（即饶家驹）作为从军神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只手。他认为，日中两军如果承认南市区的一部分为难民区的话，有可能保障二三十万中国人的生命。”苏智良称，事实上饶家驹在“一战”爆发前就来到上海。他的右手是在徐汇公学任教时为了保护学生不慎炸掉的。但当时的上海，人们一直传说并相信饶神父的手是“一战”期间被德军炸断。无论如何，由饶家驹请田伯烈与日人交涉，而诸如松本重治这样在中国混迹多年、曾独家报道西安事变的日本记者，在侵华日军和日本政界高层也有一定人脉。饶家驹在松本的协助下与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等直接会面，终于令这几个日酋以及当时的日本驻华使节纷纷同意在上海设立安全区。此后，

饶家驹迅速与中方协商。“饶家驹因曾被聘用为大上海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与当时中国政界建立了友谊。因此，迅速与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取得联系，并得到了俞鸿钧的回信。信中，俞鸿钧表示自己将很荣幸为饶家驹组建的国际委员会的先生们服务。国际委员会成员除了饶家驹，还有麦克那登将军、白蒲先生、G.芬德利、H.贝伦特、贾斯帕先生、W.普兰特先生等——看名单，一众欧美人士。

即便如此，当时上海政界人士、报界、民间等等，仍有许多疑惑之声。“虽然饶家驹是出于救援更多难民的目的倡议建立安全区，但当时中国方面仍有人疑虑重重。饶家驹要向其保证安全区的主权仍归中国政府，在南市建立安全区比将之变为焦土更为有利！”苏智良分析，“也正因此，饶家驹多次协调，才令互相视为敌人的中日双方都认可其为调停人，分别与俞鸿钧、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商定，在南市设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安全区——饶家驹安全区（La Zone Jacquinot），获得各方认可。”

终于，1937年11月9日中午12时，南市上空飘起红十字旗帜，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

因何上海拿到这个第一

饶家驹在建立安全区的声明中写道：“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同时，他还表示，“筹商此举，确非为法人利益起见，亦非为保全南市中教会之产业”，为的是“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人员，此举始告成”。

那为何在南京，同样是松井石根指挥日军，许多日军部队是从上海开拔至南京，而却发生了大屠杀，致使30万中国同胞罹难？在苏智良看来，有几大因素可以比较上海与南京两地的状况。“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侵华日军主要是在攻击上海